

T9637



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题目：通向冲突之路

——论印度边界政策与中印领土争端（1949—1962）

姓名：马荣久 19811820549 (手机)

学号：10424825

院系：国际关系学院

专业：外交学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

导师姓名：牛军 教授

二〇〇八年三月

内 容 摘 要

本篇论文以 1949 至 1962 年间的中印领土争端作为分析个案,阐述印度在中印领土争端演进过程中相关的政策及其决定因素、相应的策略及其变化动因,从而为此一阶段中印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发展趋向,以及 1962 年边境战争的最终爆发提供一种解释。

首先,依循地缘政治需要和周边形势的变化,最大限度地扩张在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影响和安全利益,是印度边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维护所谓印度同中国西藏和新疆接壤的北部边境的安全。基于此,印度政府一方面竭力支持所谓西藏的高度“自治”,以及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印中之间的“缓冲区”;另一方面,通过外交的或者军事的手段,想方设法单方面在中印边境存在争议地区确定一条边界线,并要求中国政府予以承认、至少是默认。

尤为关键的是,在印度决策者看来,西藏局势的演变、尤其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印度北部边境安全以及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严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边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与西藏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冲撞,十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同中国的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日益凸显出来——这同时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默认其单方面主张的边界线——的时候,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搁置策略已经处于改变的前夜,而随之发生在中国西藏的叛乱事件,以及中国政府平叛的有关举措,客观上起了印度边界政策从搁置到升级变化的催化作用。

其次,印度政府制定与实施其边界政策包含着强烈的国家威望的诉求,甚至赋予某一特定行动超出其实际重要性的威望。独立后的印度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相当浓厚的国家,文明自豪感、历史荣誉感与政治抱负等,是影响它的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决策者看来,印度争做世界大国和扩大国际威望的努力,既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又面临来自同样是亚洲大国的中国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印度而言,中印领土争端远远超出了争议领土本身,而是对于印度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的挑战,牵涉到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

印度领导人刻意地认为，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关乎印度的国家威望，但是追求国家威望的政策却走过了头。其中的要害是印度领导人的“受害者心理”。正是基于所谓“受害”的敏感与恐惧，印度决策者一味夸大中方敌意和威胁，以及相应的己方权力与威望受损的程度；与此同时，印方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立场，而对中方的主张趋于不加理性分析地简单否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决策者的“受害者心理”促使其不能忍受边界问题继续被搁置而边界主张不被默认。进而，它抛开谈判解决争端的做法，采取外交上的压服，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升级争端，胁迫对手屈服。

第三，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与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边界政策，一直以来就受到国大党内部的右翼、反对党派以及其它政治势力的挑战。当中印领土争端凸显以后，这种挑战直接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压力，甚至堂而皇之地被用来实现政治权力斗争的目标；另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推行公开外交，并且经过情绪化和不负责任的媒体推波助澜，导致公众舆论的巨大声浪。其中既大唱反华的高调，也不乏指摘政府的声音。面对着已经造成的被动局面，印度政府尾随而不是引导舆论。可以说，印度政府升级领土争端的做法既适应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又迎合了所谓公众舆论的热切期待。同时，它也服从于印度领导人对于权力和威望的诉求。

论文最后论述了印度边界政策与中国政府在应对争议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上日渐显露出的对立与冲撞。这一点与 1962 年 10 月 20 日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直接联系在一起。印度使用武力、升级争端的做法，不仅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实质上的威胁和侵犯，同时也对于中国的国家威望形成了直接挑战。中国方面的反制措施无疑是对于印度政府升级争端的强烈回应。

基于本文的研究，作者认为，在充分兼顾有关历史根据和各自的现实利益的情况下，边界问题上的决策者需要政治勇气、有所超越。这无疑是一个有关各方实现相互理解和谅解、协调利益冲突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领土争端应被避免成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的衍生物或者为其提供“合法机制”。同时，领土争端的最

终解决必然涉及到双方“互谅互让，有取有舍”。这不仅需要两国政府的共识，而且需要两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两国政府都不能不对此予以慎重考虑，要做充分的、健康的舆论引导和宣传。

需要着重指出的，对于未来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任何一方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彻底摆脱“受害者心理”，代之以全面、客观和冷静地看待领土争端，并在理解彼此关切、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关键词：

领土争端 边界政策 国家威望 国内政治 “受害者心理”

The road to conflict

——India's boundary policy and the Sino-Indian territorial dispute (1949-1962)

Ma Rong-Jiu (*Diplomacy*)

Directed by professor Niu Jun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India's boundary policy towards the Sino-Indian territorial dispute from 1949 to 1962. Accordingly, the dissertation provid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that is, how all three variables, expansion of geopolitical interests, pursuit of prestige and spoiling of domestic politics, combine to determine India's standpoint, goals and behavior pattern regardi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Firstly, to India, acquiring the greatest advantage in terms of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 was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its boundary policy. For this reason,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ttempted to maintain Tibet's "buffer zone"; on the other hand, Nehru government delimited a boundary line unilaterally and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to ma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ove, at least tacitly. Particularly, in the view of Indian decision makers, the change of Tibet situation and status surely brought a greater challenge to India's security and prestige in this region. As a consequence, suppression of the rebellion in Xizang of 1959 played a "Catalyst" objectively in the course of change of Indian boundary policy, i.e. from delaying to overriding and escalation.

Secondly, India's boundary policy embraced the urgent demand for prestige, and did too much when it invested a particular move with a measure of prestige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its actual importance. Indian political elites represented by Jawaharlal Nehru spare no efforts in protecting what they conceived national boundar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o Ind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was far beyond the disputed territory itself, but did matter to Indian dignity and

prestige.

It was noted that India's policy of prestige had got entangled with its leaders' cognition psychology. Due to "Victim Mentality", Indian policy makers had exaggerated so called China's hostility and threat, and simultaneously overestimated their own standpoint. So we could say that Indian leaders' "Victim Mentality"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was the crux of the escalation of the Sino-Indian territorial dispute.

Thirdly, Nehru government's boundary policy was entangled in domestic politics. On one side,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was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power rivalry by some Indian politician. On the other side, Nehru government followed rather than guided the public opinion. Consequently, Indian government and its leader were vulnerable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internal. It followed that Indian behavior pattern, such as overriding and coercion, not only met the demand of power rivalry, but satisfied public emotionalism, however, did harm to Sino-Indian relations.

The dissertation also points out the collision between India's boundary policy and China's standpoints and principles. On that account, we could say that Chinese counter-attack is just the result of Indian escalation toward border disput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hould be regarded as "legal mechanism" for power politics in no way by any side. Equally important, two governments should guide public opinion positively and win the support from their nationals for the resolving of border dispute on the basis of multi-concessio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decision makers from any side should get rid of "Victim Mentality"; instead, they should deal with territorial dispute comprehensively, objectively and soberly.

Key Words:

Territorial dispute, Boundary policy, prestige, domestic politics, "Victim Mentality"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1
二、国内外关于领土争端与中印领土争端的研究	/3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
四、论文框架结构	/18
第二章 解释印度对华边界政策及其决定因素	/21
一、印度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问题	/21
二、印度对华边界政策及其决定因素	/28
三、印度对华政策与边界政策	/36
第三章 寻求默认：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搁置策略	/39
一、西藏“消失”后的外交与军事	/39
二、中印协定与边界问题	/45
三、地图纠葛背后的政策选择	/49
小 结	/52
第四章 压服：印度“不承认，不谈判”领土争端	/55
一、不承认存在领土争端	/55
二、不谈判解决领土争端	/62
小 结	/68
第五章 胁迫和虚张声势：印度升级领土争端	/71
一、升级策略与胁迫和虚张声势	/71
二、先行抢占	/72
三、“清除”行动	/77
小 结	/81
第六章 决策者与国内政治：从搁置到升级的变化	/85
一、决策者的“受害者心理”	/85
二、国内政治压力	/96
小 结	/104

第七章 冲撞：印度边界政策与中方的政策和立场 /106

一、搁置策略 /106

二、互谅互让？ /110

三、升级与反制 /115

小 结 /119

第八章 结 论 /122

附 图

1、中印西段边界的历史发展图示 /23

2、中印东段边界的历史发展图示 /25

3、中印边界问题示意图 /26

4、中印东段边界的争议地区图示 /57

5、中印西段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图示 /59

附 录

1、内政部长斯·瓦·帕特尔致总理尼赫鲁的信，1950年11月7日 /127

2、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中国和西藏的备忘录，1950年11月18日 /129

3、尼赫鲁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9年3月22日 /131

4、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9月8日 /134

5、尼赫鲁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9年9月26日 /140

参考文献 /152

后 记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领土争端，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亚洲新兴的两大民族独立国家，当时似乎已经走上携手合作的道路，但随后因为历史上遗留下的边界划界和领土归属问题，进行了一场短促、激烈的边境战争。

诸如此类的因为领土争议而引发的国家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是国际关系领域并不少见的现象，它也因此不断引起有关研究人员的兴趣并考验着他们的智慧。面对上述现象以及有关后果，人们不断要问：为什么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有时并不引人关注而在一定背景下却演变为冲突或战争？相关国家的决策者如何认识他们国家的边界以及同其它国家间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他们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是什么？追求目标的途径又是什么呢？

本篇论文尝试着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作者拟以 1949 至 1962 年间的中印领土争端作为分析个案，阐述印度在中印领土争端演进过程中相关的政策及其决定因素、相应的策略及其变化动因，从而为此一阶段中印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发展趋向，以及 1962 年边境战争的最终爆发提供一种解释。

本文为揭示印度在处理争议的边界问题上的有关政策、策略和行为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即扩张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需要、国家威望的诉求以及国内政治考虑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印度在争议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模式。运用这一解释框架，论文从不同角度并且综合运用多个变量，分析印度政府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与策略、相应的行为及其变化。基于上述分析框架，论文在阐释领土争端中的印度政府有关行为的过程中，注重对其国内政治包括权力斗争和公众舆论等有关因素的分析，以及对主要决策者认知心理和决策动机的考察，从而可以从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理解 1949 至 1962 年间中印领土争端中的印度政策的发展演化。

不论从学术的意义上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本文的选题和研究有其重要价值。诚如有学者所指出过的，“从国际政治的学理思想发展来看，思想者

和学者多年来集中考虑的国际政治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从国际政治的实际来看，这也是决策者面对的客观世界。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关系到我们的世界和世界上的国家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固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却是国际政治中的永恒命题”^①。为着更好地理解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人们特别需要关注和认真思考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和领土争端。这是因为，相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其它方面，比如说贸易摩擦或者人权问题，领土争端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升级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冲突与战争。据统计，从 1946 年到 1988 年间全世界 280 起危机事件，其中近一半直接缘起于领土争端，或者说它们在国家间关系恶化和危机爆发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②本篇论文通过集中探讨中印领土争端，期待有关结论和看法能够进一步丰富学术界对于冲突理论以及引发冲突的各种因素（尤其是边界纠纷和领土争端）的认识和理解。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印领土争端以及作为高潮的边境战争不仅值得继续回顾和探讨，而且有待于进一步的反思与总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印领土争端、尤其是边境战争的发生是国际关系史上和中印两国关系史上非常不幸的历史事件。双方的争吵与冲突不仅未能解决两国在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反而进一步造成了两大邻国关系中的误解、隔阂甚至怨恨。时至今日，1962 年的边界战争在中印关系史上仍是一片浓重的阴影，成为不少印度人抹不去的心痛。这场短暂的边界冲突，在印度甚至被夸大到一场“卫国战争”的高度，在印度举国上下形成一种“挫折感”和难以消弭的“国耻”情结。在不少印度人，甚至一些对政府决策颇有影响的人士看来，中印领土争端和边境战争是中国背叛和欺骗了印度的友谊，是中国进行“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中国为了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并寻求遏制印度成为有影响力的亚洲大国而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印度用所谓善意经营对华政策的失败。自以为受委屈的印度一直要求中国对印度道歉，并且让中国承担“侵略者”的责任。这种心理情结成为两国互谅互让地解决边界问题的障碍和隐患，甚至造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1 页。

^② Paul K. Huth, *Standing Your Grou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4.

成后人对中国的仇恨乃至报复心理。^①消除这种误解与偏见，需要扫除历史的迷雾，认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自 1949 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为解决历史遗留下的与多个邻国间的边界问题进行了不懈努力；时至今日，已经与大多数的相关国家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妥善地解决了争端。然而，中印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并且正横亘在有待长足发展的两国关系中间。如 40 年前阿拉斯太尔·蓝姆（Alastair Lamb）所断言，“北京和新德里彼此的态度要有任何改进，几乎肯定要包含对边界争端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得到某种解决”^②。如何妥善地解决中印两大邻国间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领土问题呢？这需要两国政府官员的奔波与辛劳，更需要两国人民尤其是有兴趣的研究者的思考和智慧。

二、国内外关于领土争端与中印领土争端的研究

一、对于领土争端的理论解释

如何理解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对此，已有的学术研究从权力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不同角度所作出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权力政治与领土争端

“正如浓烟预示着大火，边界象征着权力。边界可以被界定为权力的外在形式。”^③因此，存在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的两个国家，当权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时，边界问题往往会凸显，争端可能要升级。对此，普雷斯科特（J·R·V·Prescott）宣称，当认为力量对比出现对自己有利的变化时，一方可能重新挑起潜伏着的争议领土问题，如 1975 年柬埔寨领导人挑起了同泰国的领土争端。^④埃文·卢亚德（Evan Luard）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他指出，如果战争能够迅速取得成功，那么相关国家将会选择战争作为解决领土争端的手段，这意味着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一国占据了支配性的力量优势将愿意升级争端。^⑤

^① 参阅王宏伟：《1962 年边界战争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载《南亚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② [英]阿拉斯太尔·蓝姆：《中印边境》，民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年，第 5 页。

^③ Richard A. Griggs, “Boundaries and War in Africa in 1995”, *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 Vol.3, No.1, 1995, p.77.

^④ J.R.V. Prescott, *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London;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100-101.

^⑤ Evan Luard, “Frontier Disputes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3, in Evan Luard ed., *The International*

边界争端往往是国家间“权力”争斗的衍生物。皮特·斯洛（Peter Slowe）认为，边界问题为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提供了合法机制并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很难说，边界问题就是冲突的主要动因，但它却经常是争论的焦点。^①对此，国际上不少学者的研究还进一步提出例证。比如，纳粹德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炮制同波兰在西里西亚以及同捷克斯洛伐克在苏台德地区的领土争端，实际上这是纳粹德国意在增加其“权力”的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如，日本和苏联围绕北方四岛的争端，实际上是双方紧张关系的副产品，因为日、苏都在努力争夺各自在世界和亚太地区权力等级中的有利位置。

需要指出，有些领土争端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变化或者恶化有关，也可以说，一国提出甚至升级领土争端意在表达对邻国的不满或者以此来增加谈判筹码。如 1958 年埃及同苏丹的领土争端看来就同埃及不满苏丹不愿同其联合有关，同时，还在于为双方随后就有关尼罗河河水权力问题的谈判增加己方的筹码。^②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理解领土争端，还必须考虑到领土的有形内容，即领土“自身的重要性”（intrinsic importance）。如加里·戈茨（Gary Goertz）和保罗·F·迪埃爾（Paul F. Diehl）指出的，领土的资源禀赋、能够提供生存的空间以及所具备的地缘安全价值等，都是其自身重要性的体现。^③因此，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争议领土越是具有上述方面的重要价值，相关国家越是愿意为它的归属而冒更大的风险。运用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保罗·K·胡特（Paul K. Huth）强调了争议领土所具有的战略安全与经济价值与领土争端发展趋向的相关性。胡特认为，如果争议领土对于一国具有战略安全方面的意义，它很可能引发领土争端；他还指出，领土本身具有的经济价值同领土争端的出现具有正相关性。不过，对于争端的升级，胡特认为，当具有战略价值的领土受到威胁时，争端往往会升级；与此同时，单纯具有经济价值的领土争端并不能显著的影响争端的升级。^④

（二）国内政治与领土争端

萨阿迪·图瓦尔（Saadia Touval）指出，就非洲大陆的情况来看，不考虑国

Regulation of Frontier Disputes, New York: Praeger, 1970.

^① Peter Slowe,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s an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125-126.

^② Touval Saadia, *The Boundary Politics of Independent Af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40.

^③ 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Territorial 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14-17.

^④ Paul K. Huth, *Standing Your Grou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72-75.

内政治因素,你就不能理解非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处理领土争端的相关行为。^①胡特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他认为,外交政策领导人很注意考虑由国内和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动力以及所造成的压力。^②换句话说,当决定挑起或者升级领土争端时,决策者一般会考虑到他们的政策选择是否能得到国内的支持从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与否。^③在胡特看来,国内政治因素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消极因素影响国家间领土问题的解决。如他认为的,决策者升级领土争端或者提出领土要求,目的是对外显示强硬立场从而赢得国内支持。^④上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证实。不过,有研究还是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比如,在当代非洲,领导人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更愿意接受边界现状,以保证多民族国家的稳定。^⑤因此,国内政治的需要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促动力量以稳定边境或解决领土争端。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容易受到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甚至往往被用以服务于实现国内政治斗争的目标?这就必须考虑到领土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领土所具有的“关系属性”(relational attributes)。^⑥如墨菲(Alexander Murphy)所言,国家的存在和自治植根于它的领土,而领土正是一个国家国民身份与凝聚力的源泉和象征。^⑦领土的变动同国家间其他形式的互动存在着“深刻的心理上的差异”^⑧,领土问题涉及到民族情感和国家声誉。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处理这类关系重大而又极为敏感的问题,任何的一点让步和妥协都可能要付出沉重的国内政治代价;相反,挑起或加剧争端,对外显示强硬立场,可能会在国内取得不错的政治回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为一国领土争端的解决提供契机。如萨阿迪·图瓦尔(Saadia Touval)所注意到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能够解决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争端并不是因为他(同其父相比)对争议领土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在哈桑二世主政期间的摩洛哥,国内国际环境已有很大变化。具体来说,原来竭力主张收复“领土”的独立党(Istiqlal Party)影响力变弱,同时

^① Touval Saadia, *the Boundary Politics of Independent Af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Paul K. Huth, *Standing Your Grou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7.

^③ Ibid., pp.41-45.

^④ Ibid., pp.50-51,59-64,144,154.

^⑤ Saadia Touval, *the Boundary Politics of Independent Africa*, pp.30-31.

^⑥ 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Territorial 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17-19.

^⑦ Alexander Murphy,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s for Territory Claim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0, No. 4, 1990, p.531.

^⑧ Isaiah Bowman, "The Strategy of Territorial Decisions", *Foreign Affairs*, 1946, pp.177-194.

摩洛哥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有所变化。^①

另外, 边境地区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接壤地带, 那里发生的事件很可能作为争端的渊藪而影响相关国家双边关系包括边界问题的解决。曼德尔(Robert Mandel)认为, 两国边境地区的民族联系会显著增加领土争端升级的可能性。^②图瓦尔的研究提供了实证。他指出, 20 世纪 60 年代索马里同其两个邻国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领土争端同边境地区的民族问题紧密相关。因为当时的索马里政府想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索马里民族的更大的国家, 并为此在同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带寻求扩大影响甚至进行渗透活动, 这就导致同其邻国的关系恶化和边界争端。^③然而, 边境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 也可以促动国家间边界问题的解决。因为此时的政策制定者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 渴求解决边界问题, 以避免和防止外部干预的潜在风险。进一步讲, 明确的边界线有助于简化对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管理与控制。

二、对于中印领土争端的研究回顾

总的来看, 学术界对于中印领土争端的关注与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角度。

(一) 中印领土争端历史的考察

历史地考察中印领土争端的缘起, 这是学术界早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这方面国外值得提及的是两位学者和两部论著。

阿拉斯太尔·蓝姆, 来自英国的南亚问题研究专家, 根据当时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资料, 其中包括学者可以利用的截至于 1913 年的英国官方档案, 从历史和法律的层面, 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到领土争端, 他认为, 中印在东段的争议牵涉到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问题, 中国提出要求“表明他们否认 1912 年以来西藏就脱离了中国的控制和在无论那一方面都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④, 而中印“西段的争议则在事实上和中国目前所控制和打算继续控制下去的领土有关”^⑤。蓝姆博士同时深刻地指出, 在 1962 年中印边境危机来临之

^① Touval Saadia, *the Boundary Politics of Independent Africa*, pp.255-262,265-268.

^② Robert Mandel, “Roots of the Modern Interstate Border Disput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4, No. 3, 1980, p.450.

^③ Touval Saadia, *the Boundary Politics of Independent Africa*, pp.34, 99-100.

^④ 蓝姆:《中印边境》, 第 158 页。

^⑤ 同上, 第 161 页。

际，印度拒不承认中国在争议的边境上的任何地方有任何理由提出要求，一直没有尝试作出它天公地道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却坚持它拥有绝对权利。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①蓝姆博士对中印领土争端缘起的历史考察，尤其是他在当时背景下较为客观和公正的立场，是值得称道的。

卡·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则是一位关注中印友好事业的印度学者。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他深感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以真实、让印度人民了解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历史责任。因此，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多次到英国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和资料，写出了一系列很有份量的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出版的《中印边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该书引用了大量的英印政府档案，对中印边界历史作了有根有据的阐述，披露了许多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史实。古普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出“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无论在条约、习惯或地理上——如分水岭原则——都是没有根据的。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要求虽在地理和习惯上有着牢靠的根据，但它没有有效的国际条约为根据”^②。

中国方面对于中印领土争端有关问题的历史考察，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徐焰、吕昭义、房建昌等学者的有关论述。徐焰的分析着墨于中印边界之战的历史真相，向人们交代了两国领土争端的历史源头、来龙去脉以及这场边界战争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等。^③在考察了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后，吕昭义指出，英国兼并阿萨姆后，逐渐北上接近中印传统习惯边界，通过一些协议，将原传统习惯边境两属地区占为己有，大体上确定了一条沿喜马拉雅山山脚的边界线。这条线即所说的“外线”。从走向上来说，与沿山脊而行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相距甚远，从时间上来说，麦克马洪线是在外线以后半个世纪才偷偷抛出。因此，绝不能将麦克马洪线理解为“外线”。“内线”是英属印度限于其统治不能有效地达到外线情况下而勘画的，实质上是英属印度的“实际控制线”。“内线”在“外线”以南，大体上与“外线”有几公里距离。^④房建昌探讨了1840—1949年间的近代中印西段边界问题，他认为，“入清以来，中印西段边界在个别地段有西藏地方政府与边外个别部落长代表间的停战协定式的界定，并无近代国家边界的严格划定方

^① 同上，第165页。

^② [印]卡·古普塔：《中印关系秘史》，王宏伟、王至亭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③ 参见徐焰：《中印边界之战历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

^④ 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式，且与各自后来的中央政府并无行政上的继承性，故仅可供定界时参考，并无国际边界法律上的效力”，“只是到了清道光朝，由于内忧外患，再加上当时的驻藏大臣对历史不了解，才默认了英印对拉达克的统治权”^①。房建昌还主要根据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档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划界的有关资料，揭示了英国在中印中段边界上侵藏的事实，论证中方今日所定边界的历史依据。^②

上述研究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印领土争端的缘起与发展，从而为争端中双方的要求提供证实或证伪的根据。然而，在笔者看来，完全纠缠于历史证据上的“谁是谁非”丝毫无助于找到解决争议边界问题的出路。尤为重要的在于我们要认清中印双方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不同认识、对历史证据的解释上的差异，以及隐藏在此背后的有关因素，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印领土争端。

（二）国内政治与中印领土争端

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不少研究分析了意识形态因素、印度议会与媒体舆论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在中印领土争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早在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印度学者莫汉·拉姆（Mohan Ram）就探讨了“中印对抗的政治学”。他从意识形态视角入手，主要分析了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万隆会议前后的中印关系、1962 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演进和代价等问题。拉姆认为，伴随着冷战对抗激烈程度的下降与缓和的开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找到了利益汇合点，印度也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的中心。“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随后于 1962 年的军事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起作用。”^③在拉姆看来，1959 年西藏叛乱发生后，中国方面就不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帝斗争中的一个有用角色；而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国和苏联的分歧确实对于中印领土争端产生了影响。^④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在其颇有影响的论著中，其中一章分析了“北京的观点”，也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的。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作为邻邦又是同属亚洲的大国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但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端——使两者合拢，因此，中国就认为印

^① 房建昌：《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载《历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② 房建昌：《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③ Mohan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Delhi: Vikas Pub House, 1973, p.2.

^④ *ibid.*, p8.

度的行动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本性，这种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中国碰撞。^①

印度学者南茜·杰特里(Nancy Jetly)从印度国内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印度议会在对华政策决策上的作用、反对派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等层面来考察 1947—1977 年间中印关系的演变。杰特里指出，尽管在中印关系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印度议会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讲，印度政府(行政部门)和议会之间的互动不断加强。尤其是随着中印关系的不断恶化，对华政策越来越成为议会辩论的焦点。在 1959—1962 年间，尼赫鲁政府不仅是向议会解释政策，甚至有意地去寻求它的指导，“议会在此期间已不单纯是教育引导公众舆论的论坛，而且对于外交政策形成有了发言权”^②。国内政治的强大压力促成了印度政府日趋强硬和僵化的对华政策，这是不少中外学者的共识。S·R·夏尔玛(S·R·Sharma)在分析印度“前进政策”出台时指出，“政府不得不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有反对党太多的压力，甚至还有（来自）国大党内部的同情和支持”^③。有中国学者提出了同样的看法。王宏伟认为，正是在党内和政府的鹰派、党外反对派、新闻界和新德里公众的不断压力下，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茧自缚的尼赫鲁，一步步被推上了同中国对抗的僵硬道路。^④

美国学者艾伦·S·惠廷(Allen·S·Whiting)在研究中国深思熟虑地运用“威慑”时，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分析了中国应对与印度的领土争端的政策和行为。在惠廷的分析中，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麻烦”，无疑是中国有关政策、行为的重要背景和驱动因素。^⑤梅尔·格托夫(Melvin Gurtov)和黄秉洙(Byong-Moo Hwang)就处于威胁下的中国的战略与外交进行了探讨。在他们看来，西藏叛乱和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党内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美、苏与中、印冷热迥异的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方决策者在 1962 年应对同印方的领土争端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很可能情况是，内部的不利因素和外部压力的互动诱使中国领导人大大高估了印度所带来的威胁，从而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反制印度，以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并修正印度对中国的错误认知。”^⑥T·S·穆尔迪

^① [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年，第 287 页。

^② Nancy Jetly, *India China Relations, 1947-1977: a Study of Parliament's Role i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Radiant Pub., 1979, p.294.

^③ Shri Ram Sharma, *India-China Relations, 1947-1971: Friendship Goes with Power*, New Delhi: Discovery Pub House, 1999, p.47.

^④ 王宏伟：《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89 页。

^⑤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⑥ 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